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于今年4月揭晓。这些考古发现时代跨度绵长、地域分布广泛。时间上，从百万年旧石器时代伊始，经新石器、青铜时代，再至宋元窑址遗迹，涵盖了古人类演化、史前聚落文明、早期国家形成、王朝疆域管理、手工业技术发展等多个学术命题。

“十大考古”串联古今、讲述人类的漫长成长史，使跨越22万年时光的何以中国之历史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焕发新生机。“十大考古”固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然而其发现过程是怎样的？历经了多少起伏与艰辛？又在发掘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为此，《中国文物报·考古专刊》推出“2025年度十大考古·领队说”专栏，以遗址发现始末、发掘精彩瞬间、研究最新进展为依托，为读者呈现考古背后的故事。让一线考古人带领我们置身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绚丽厚重的文明。用大众语言，将深埋地下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时代画卷。

十大考古 领队说

#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亲历记

龚湛清

近年来，在多方支持下，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然而，该遗址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如何发掘的？在考古过程中有哪些趣事？这些问题可能是大家很感兴趣但以往很少被提及的，下面，请让我从一名亲历者的视角出发，为大家讲述郑家沟的考古故事。

##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说来也是缘分，我竟也是最早接触到宣化积石冢群的考古工作者之一。2021年3月，我随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战护副院长、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魏惠平主任一同前往张家口市宣化区开展“冀西北坝下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与尚义四台遗址相关的具有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性质的遗存，为探究人类何时从流动走向定居，早期农业如何起源等一系列问题提供基础资料。

我们首先拜访了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刘海文所长和王继红书记，想跟他们初步了解一下当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有关情况。在与他们交谈过程中得知，因崞村镇一带要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遂对所涉地块进行了考古调查，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石堆遗迹，周围还散布有碎人骨、蚌片、天河石等遗物。由于此前在宣化地区还从未发现过这类遗存，遗迹内也未出陶器、玉器等具年代指征性器物，其性质与年代一时难以判定，希望调查队能一同前去看看。

于是，当日下午我们即驱车前往崞村镇“一探究竟”。该镇历史底蕴深厚，拥有柏林寺、水泉堡等众多古迹，东北距宣化区约15公里，北距洋河约11公里，南距桑干河约16公里，向东翻越黄羊山就是涿鹿县。随着不停地往山里深入，我们的心也愈发忐忑，为什么有古迹会建在崇山峻岭之间？难道是与长城相关的遗迹？大家感到困惑但也有些兴奋。不久，车停在了一处山坳里，不知又向上攀爬了多久，终于看到了那些让我们“魂牵梦绕”的石堆，那种震撼，至今仍记忆犹新。只见这些石堆规律地分布在雷公山群山之间，平均海拔1100多米，它们或“孤峰耸立”或三两一组，看着石堆周围破碎的人骨，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划过，忍不住打了个冷颤，“难道这些是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为什么距离辽西300多公里外的宣化会突然出现红山文化积石冢？”“这里距离涿鹿可是只有一山之隔啊，如果这里有，那么涿鹿呢？张家口其他县区呢？”一时间，只觉脑海中有无数念头在汹涌着、翻腾着，将我牢牢地钉在了原地。

确实，能在海拔这么高的山顶发现除长城以外的古代遗迹，这是此行未曾想到的，虽然此次在石堆周围没有发现人骨以外的任何遗物，一时难以判断遗迹年代和性质，不过毋庸置疑，这些确实是古人所留。接下来几天里，我们在完成既有调查任务的同时，也一直在留意，希望能找到更多破解“谜题”的线索。无奈时间紧任务重，只得按照既定路线先前往赤城县，但在离开时我们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做好新发现遗址点的文物保护工作，二是要注意在宣化其他区域是否也有这类遗存，新发现多了，可能离“解密”也就近了。

果然，不久后的2021年底，恰逢全省考古工作年终汇报会在石家庄召开，王继红所长从宣化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在西起塔儿村乡，东至庞家堡长达80公里的山间新发现了形制各异的积石冢100余座。看着她手机里不断闪过的精美玉器照片，我由衷地替她高兴，这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知攀登了多少座高山，翻越了多少道山梁才好不容易寻觅到的“胜利果实”啊！

## 驽马不堪蒙锦绣，感恩唯有泪沾衣

到了第二年秋季，也就是2022年9月，我终于有机会再次前往宣化，第一次见到了这5000年前古人在山顶的“杰作”。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初次站在郑家沟一号积石冢上，直面这庞大的古代建筑时，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科学、有效地发掘眼前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石头？”以往，我们考古发掘面对的均是埋在土里的各类遗迹，只要能熟练地运用好地层学，布好探方，一层一层往下揭露即可，其中讲究的是辨认土质土色的“功夫”。然而，此次面对的是这样一大堆“石头疙瘩”，到底要怎么发掘？一时感到很茫然，丝毫没有头绪，也替刘海文所长发愁。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到了2023年末，我正带队在涿鹿县开展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张文瑞院长例行来到涿鹿对调查工作进行调研检查，临走前他突然对我说“小龚，你毕业后来院里工作也有多年了，我打算让你明年开始负责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我一时被这个消息震惊得手足无措，只得呆愣站在原地，见我长时间没有回应，张院长补充道“你不必过于担心，我已经过慎重考虑。一是你在四台跟赵战护历练多年，对于什么是基层考古，如何主持考古工地已然‘心中有数’；二是你研究方向本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红山文化你再熟悉不过，交给你我也放心。看着你们这群年轻人一天天成长，是我最欣慰不过的。所以，自信一点，年轻人，终有一天你要站在台前面对这些，尽管放手去干吧。”

看着领导满是期许的目光，我只觉胸口涌出一股暖流，但想到自工作以来在尚义渡过的多年时光，一时许多美好回忆涌进了我的脑海。作为一个从小在辽西山区出生、长大的孩子，我对草原有着莫名好感，小时候的我总是爬到家后面的山顶，向北遥望，想象着草原的壮美与辽阔。直到毕业多年后，终于有机会长时间在草原上驻扎，并从事我最爱的考古工作，一时竟感到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想到即将离开我最爱的草原，前往下一个陌生的地方，迎接全新挑战，只觉得心里五味杂陈，有离开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只得硬挤出一个笑容，回应道“我试试看吧。”就这样，既是“临危受命”也是“赶鸭子上架”，在2024年春季，我从坝上来到了坝下，开始负责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墓葬套箱提取

## 幸托骥尾襄盛举，衔环结草谢深恩

初到宣化，可谓“两眼一抹黑”，院里只我一人，连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没有，何谈开展考古工作？现在想来，多亏了市考古所魏惠平和李军主任，凭着多年在尚义四台“衣同袍，寝同眠”的革命友谊，他们先帮我跟塔儿村乡政府“号房子”谈好了租金，自此才有了落脚点。随后，又帮我一起收拾屋子、规划院子，找郑家沟村支部书记谈考古发掘用地相关事宜，给张家口各文博机构打电话帮我借人组织队伍，甚至跟领导申请将所里暂时不用的旧物什无偿借给我们使用，好一顿折腾，才终于有了一点考古队驻地的样子。不久，尚义四台遗址开工了，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尚义，开始了又一年的考古发掘。

与此同时，区文管所王继红所长与张艳霞副所长也一直在为郑家沟考古工作顺利开展而跑前跑后。为了方便考古队用水用电，她们不知跟乡政府沟通了多少遍，为了尽快办理发掘临时用地手续，她们更是一天要跑多趟自规局。见我手下实在无人可用，她们更是将培养多年，具有丰富田野考古发掘经验的技工们送到了工地，供我调配。即便如此，她们仍对我说“小龚，知道你这人比较腼腆，平时也不爱说话，总怕麻烦我们，但你不用不好意思，只管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古发掘之中，其余一切事项可全交给我们，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我们能出人出人，能出力出力，大伙儿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至此，发掘前的准备工作才终于告一段落，但因我常年在坝上参与尚义四台遗址考古工作，其间仅在2022年前往参观过一次郑家沟，所以对它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虽然我曾在蒙古国发掘过青铜时代石板墓，也曾在句容清理过战国土墩墓，在临江接触过高句丽积石墓，但独自面对红山文化积石冢还是头一次，怎么办？只得向专家请教。刘海文所长，是河北考古学界老前辈，即使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每日亲自参与考古资料整理，从测量、描述，到拍照、绘图，全部亲力亲为，其对待学术之严谨，孜孜不倦之精神，令我汗颜。

我与刘所虽并不陌生，却也谈不上熟悉，只是以往来宣化时与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从未真正坐在一起，有过更多更深入地交流，且他对于宣化积石冢群的发现与发掘有着“开创”之功，已然快到“瓜熟蒂落”之际却突然“临阵换将”，来了一个才参加工作没几年的晚辈，难免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嫌，此乃学界大忌，也不知他如何看待此事。无奈，时间不等人，工作仍要继续，我只得硬着头皮，怀着忐忑心情向他请教，没想到刘所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他这些年实践所得宝贵调查经验和发掘心得全部“倾囊相授”，甚至将初步整理完成的调查报告和发掘简报打印成册供我参考，真可谓是毫无保留。

然而，即使从刘所处取得了“发掘秘籍”，但距熟练掌握，直至运用自如仍需一段很长距离。我只得一边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紧张的现场发掘之中，边动手边摸索，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不断总结经验，一边找来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结合着求学至今积累的十余载田野考古经验，反复认真研读。同时，刘所也几乎每周都会来到工地上与我交流最新研究进展，并一起探讨发掘中的“得与失”，对我给予指导。如此，经过了两年多努力，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完成。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前，宣化郑家沟遗址与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未来道路仍旧艰险漫长。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宣化区委、区政府对于文物保护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在短期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采取增设物理围栏、加装监控、派专人定时巡护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境内100余座积石冢均得到了应有保护，为后续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保存了珍贵资料，还计划通过搭建文物保护大棚、博物馆升级改造、编制遗址保护规划等方式，使得考古成果能够尽快完成转化，更快、更好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惠及当地百姓。他们更是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与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合作，探索人造卫星、无人机、机器狗在文物保护过程中的应用，将来有望与矿山监察、国土资源监测共享同一平台，对文物点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巡查，为文物保护工作建立长效机制。

但也无须讳言，未来我们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每当我外出开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同场发言之时，均感到身上有如“千钧重负”，尤其是研究“红山文化”问题的学者们提问之际，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几乎令我窒息。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区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通过调查、发掘和研究，已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成果，不仅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展，对既往分析总结的同时也为未来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方向，对资料的再整理和新认识也为两地开展红山文化深层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相较之下，河北省红山文化研究基础仍比较薄弱，尚处于原始材料积累阶段，这就导致我们对于“河北红山”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仍旧认识不够清晰，学界对于郑家沟这批遗存是否属于红山文化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我相信，未来随着考古工作逐步开展，基础材料逐渐增多，研究必将一步步走向深入，“郑家沟”的意义与价值也必定能够得到应有阐释。

回首过去，宣化积石冢群从发现至今已过了五年，在这五年之中，有无数瞬间让我每每想起，均红了眼眶。从冢上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匠”们，到每日起早贪黑，只为把大家照顾得更好的后勤保障者们，再到无论严寒酷暑，均在山顶毅然坚守的“守夜人”们，每个人都为工地做出了牺牲，付出了努力。若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取得了任何荣誉，那均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考古过程中固然非常辛苦，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要感谢每一位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才使学界有幸掀开了“文明之谜的一角”，一窥“5000年前的神秘”，我为成为郑家沟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更为大家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

谨以此文向多年来持续关心、爱护郑家沟的师友们致谢！更向那些仍常年坚守在田野一线，默默奋斗的考古工作者们致敬！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纪实

吕凯

在黄海西岸的山东半岛南端，一座名为琅琊台的山峰三面环海，巍然耸立。两千多年来，关于“琅琊台”的争论从未停歇——它究竟是因“山形似台”而得名，还是真如《史记》所载，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在山巅筑起的巍峨高台？2019年，随着琅琊台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这座海上高台的神秘面纱，终于被缓缓揭开。作为山东省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秦汉时期考古项目之一，历时七年的琅琊台遗址发掘不仅是一次对古代大型国家工程的实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对秦汉王朝统一融合的深度探寻。琅琊台的考古岁月，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成长经历。

## 缘起琅琊：发掘背景筹备工作

我对琅琊台的向往，始于2011年进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初。那时在任的郑同修院长曾多次讲到：“山东秦汉考古，琅琊台是绕不开的课题。”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琅琊台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需要以翔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有必要进行一定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在郑院长主持下，我参与了琅琊台遗址考古工作方案的编写，收集了大量资料，对遗址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大致认识。另一方面，我的同学郑陆红、师兄彭峪在青岛考古所工作，我们曾多次聊起琅琊台遗址的情况。多年来在林玉海所长带领下，他们对遗址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工作。“大台”“小台”、夯土层、陶管道，这些名词从他们口中说出，仿佛带着历史的温度，让我对琅琊台有了更生动形象的认识。2015年，我在黄岛区发掘汉墓期间，曾跟随区博物馆翁建红馆长到过琅琊台。当我第一次站在琅琊台山顶时，置身于山海之间独特景观之中，内心被深深震撼。脑海中反复背诵《史记》中关于始皇东巡筑台的记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只是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已与琅琊台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2019年初春的一天，当时分管田野考古业务的孙波副院长通知我，尽快准备好琅琊台遗址主动发掘的申报材料。几乎就在同时，青岛考古所的彭峪师兄跟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沿海岸调查中，于琅琊台东南方向的海边断崖发现了战国时期瓦片堆积。这一发现意义非凡——这些堆积早于秦始皇东巡，暗示了遗址内存在更早的建筑营造。他们也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启琅琊台考古工作。于是，省、市考古院所联合向主管部门提交了主动发掘申请。不久，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年度发掘证照，同意山东考古院和青岛考古所共同作为主持单位，对琅琊台遗址进行700平方米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发掘获批后，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深知责任重大。为了进一步了解更多遗址信息以确定具体发掘方法，同时对遗址环境和遗存分布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先组织了一次考古调查。以此为契机，考古队也初步组建起来，人员包括我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敬伟、陈辰、李召恒，青岛考古所彭峪、杜义新以及黄岛博物馆李祖敏等多位同事。由于有了市、区兄弟单位前期工作基础，调查目标明确，过程非常顺利。开始时是四月上旬，内陆已经暖阳融融，而海边仍是春寒料峭，呼啸的海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我开玩笑地发了个朋友圈，起名为“重穿秋裤，再访琅琊”，考古工作就这样正式启动了。

## 拨云见日：高台现身山海之间

在调查勘探基础上，最初的发掘区最终选定在两个关键位置：一是主峰山顶，二是东南海岸发现战国瓦片堆积的地点。山顶是遗址的中心和制高点，也是发现夯土面积最大的区域，要解决关键问题，就必须对山顶进行发掘。海边地点青岛的同事做了详细的前期工作，易于入手，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早于秦始皇东巡的遗存，这对于我们以往的认识是一个突破。为了记录方便，要对两个地点进行简洁明确的命名。山顶被大面积夯土覆盖，命名为“大台”；海边地点有建于清代的亭子兰炮台，当地人把“亭子兰”作为这一片地的名称，我们也以此命名。两处地点的发掘同时开展。其中，大台地点选择山顶西侧树木稀疏的缓坡，在坡上我们布设了一条长30米、宽2米的东西向探沟，采用小面积解剖的方式，尝试以最小的切口了解尽量多的信息。在琅琊台风景区和琅琊台社区的大力协助下，考古发掘顺利进行。

大台发掘区的探沟中，我们除了直观了解到夯土台基的结构外，还发现了大量建筑材料，包括板瓦、筒瓦、云纹和“千秋万岁”文字瓦当，以及带有纹饰的铺地砖等。一件件文物如同拼图碎片，不断拼接起历史的真实样貌。考古队员每天按部就班，清理、拍照、记录、绘图，专注而又充满期待。

2019年11月中旬，天气逐渐变冷。一天下午，探沟东部清理出来一块加工规则的石板，和之前出土的其他文物不同，石板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应该是没有被扰乱。顺着石板轮廓继续清理，发现是一个长方形遗迹的一部分，这个遗迹呈方形，边长一米多，由多块三角形、长方形石板组成，石板之间严丝合缝，边缘向内侧倾斜，最中心是一块带有孔洞的方形石板。现场有同事惊奇地说：“这不像是卫生间的地漏吗？”后来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秦代房间内的排水设施，孔洞下面还连通着地下陶管道，其作用与现代地漏无异。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普遍注重排水，有完备的排水设施，陕西等地也发现了砖砌或者陶制的地漏，但是石板砌成的地漏，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发现。这个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都认为是个“好兆头”！

以地漏的发现为线索，我们继续发掘，于2020年至2021年在大台地点发现了一个房间，又在其周围发现了走廊、排水管道以及登台踏步。2022年至2025年又在山顶东部发现了天井、院落门址、石铺路面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山顶建筑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了。根据发现我们推测，山顶曾经存在一处高台建筑。这里的“高台建筑”不仅是高高的土台上有座建筑这么简单，而是指以坚实的夯土作为核心，外观上分为多个层级，顶部有主要殿堂、每层有依附于台基的房间和回廊，非常繁复壮观的一种建筑形式。自东周至汉代，高台建筑非常流行，所谓“高台榭，美宫室”，这种建筑往往具有很高的等级。

“琅琊台”的名字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其得名到底是因“山形似台”，还是“山上有台”呢？实际上在古代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即便有《史记》中秦始皇筑台的记载，很多文人学者还是不相信山顶建台是人力可为的事情。明代陈烨《琅琊台论》里说：“其称台者，以山形南面平衍，而上巅复宽平，有类于台，故谓之台，非于山之上又复为之台也。”而且他还指出山上建台“岂人力所能起哉？”现在通过发掘，我们终于可以拨开琅琊台的神秘面纱，知道琅琊台的“台”字名副其实，就是一座屹立于山巅的高台建筑，从而也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山上多石少土，面积达四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基础需要从山下大量运土上山，再以人力进行细致反复的夯打。这么大的工程量是怎么完成的呢？《史记》载秦始皇为此“徙黔首三万户”，即迁徙了三万户，也就是十多万人。作为辛劳工作的补偿，还免除了这些移民十二年的徭役。今天的我们站在发掘区，透过眼前层层夯土和累累砖瓦，仿佛能穿越时空，领略山顶高台建筑的宏伟壮观，同时也能看到万千秦代普通百姓忙碌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建造起了这座伟大的建筑。他们的汗水，滴落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 瓦当为证：确定建筑年代等级

山顶建筑的砖瓦来自何处呢？是就近烧造还是远方运来？在发掘的同时，更加详细和有目的性的勘探工作仍在进行。在琅琊台南部山下，我们发现了重要的线索。在山下西南有条山上延伸下来的冲沟，据说沟边的农田在耕种时常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坚硬土块，是经过火烧的，村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和烧窑有关，于是把这条沟叫作“窑沟”。

在调查中和勘探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里的碎瓦片比别处更多一些。发现这个线索，考古队员非常兴奋。在2022年，我们启动了对“窑沟”东侧地点的发掘。随着地表的耕土逐渐被揭掉，一片片形状规则、边缘齐整的红烧土区域露出来了，是陶窑！2022年至2023年两年的发掘中，我们一共发现了10座陶窑，虽然窑的上半部都已经被破坏了，但基本形状还在，能够看出是属于半倒焰窑类型。在窑室内以及旁边的沟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砖瓦类遗物，其中很多形状扭曲，显然是制作失败的残次品。出土绳纹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等都与山顶所发现的完全一致，显然这批窑就是为山顶建筑提供建材的砖瓦窑。

在大量遗物中，有几件瓦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几件瓦当形体较大，上面的图案非常特殊，叫作“夔纹”。这种大型夔纹瓦当之前只在辽宁姜女石秦行宫、陕西秦始皇陵等秦代宫殿、陵园建筑中出土过，学界认为是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这个重要文物让我们异常振奋，没想到在远离秦都咸阳的黄海之滨，也发现了同样的大瓦当！大型夔纹瓦当的发现非常关键，一方面证明这批窑的年代就是秦代，连带着也坐实了山顶建筑的主体年代；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建筑的等级至高无上。综合所有发现，山顶高台建筑毫无疑问正是秦始皇修筑的“琅邪台”。

## 拼图完整：厘清遗址时空格局

2024年至2025年，我们又在山南偏东发现了秦代院落基址，这是一处边长约120米的正方形夯土院落，四周有院墙，院内发现东西对称的长方形建筑基址。院落基址夯土结构、出土遗物与山顶一致。在山体南坡，我们通过勘探和试掘，又发现了连接山顶和山下建筑的道路。山顶高台建筑与山下院落共同构成一处秦代始建、汉代修葺的高等级建筑群落。

遗址内还存在早于秦代的建筑遗存。2019年至2021年我们发掘的东南海岸的“亭子兰地点”，证实是一处由长廊和院落组成的战国时期建筑群，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齐文化特征，印证了战国田齐经略琅琊的文献记载。2023年至2025年，我们又对东部海边的“小台”进行了试掘。这是一座依山体夯筑的大型平台，夯土结构与工艺也呈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这些发现为我们追溯琅琊的早期历史，全面把握遗址内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多年度持续考古工作，琅琊台遗址在时空维度上的整体格局逐渐完整呈现。我们掌握了秦汉琅琊台建筑群“山顶核心—山下配套”的完整体系，同时也厘清了遗址内建筑“战国齐—秦—西汉”持续的发展序列，完整还原了琅琊台从齐国滨海重镇到秦汉国家地标的历史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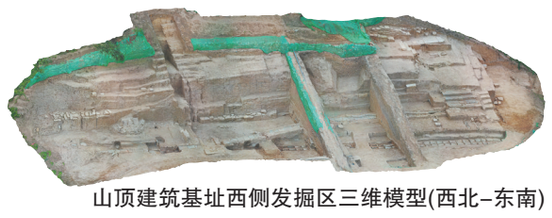
多年度持续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琅琊台遗址考古成果先后入选2021年、2024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并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得到了考古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发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成果的取得，来自每一位考古队员的常年坚守、来自省、区、市三级机构协同作战、多学科交叉支撑的工作模式，更来自“保护第一、考古先行、服务规划、强化阐释”的科学理念。

当前，琅琊台考古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未来重点方向包括：一是加强对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完整复原建筑群布局与结构；二是推动深化多学科合作，开展年代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手工业技术等专题研究；三是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加强文物保护、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让考古成果走出库房、走向社会。

## 结语

黄海潮声，不绝于耳；秦台巍然，见证千秋。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拨开千年迷雾，实证了秦皇东巡、徙民筑台的壮阔历史，揭示了秦汉王朝经略海疆、开拓海洋的宏大格局，展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作为考古人，能够亲手触摸始皇帝留下的历史丰碑，感受秦汉王朝的雄浑气象是何等的幸运！我们也下定决心，将继续努力，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历史瑰宝，以考古成果书写更加清晰、更加厚重的文明篇章，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山顶建筑基址西侧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东南）